

锻造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工夫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研讨会述要

马士彪, 郑涵丹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46)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0)01-0123-05

2019年12月28日,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湖北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学界关注的观点。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兹将会议成果略述于此,与同道分享。

一、研究方法的文献功底

作为学问研究的对象以及哲学创新的资源,经典文献无疑更是研究的根基与灵魂。因此,对于方法论的探讨,离不开文献的前提。李振纲教授认为,研究技巧固然重要,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到底技巧离不开文献的功夫,所以方法是建立在对于经典精熟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经典作为支撑的研究,就缺少了抓手和依据。中国哲学是围绕经典形成的,现在做中国哲学的研究,要掌握“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学”(《老子》《庄子》《易传》)“两史”(《史记》与《汉书》),掌握了这些经典以后,通过孔、孟、老、庄、易的对比,就可以研究生命、君子、圣人、天人关系等问题。后来的学术发展,不管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都是从这些经典中生发出来的,所以要精读经典。杨海文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编刊与教学的经历,分享了自己在不同阶段对于文献与研究方法之间互动关系的体会。杨教授认为,在不同阶段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文献的态度与认识也有相应的变化。他从三个阶段具体地反思了文献在不同的阶段是如何对我们发挥影响,影响我们慢慢的推进自己的研究的。首先是学生的阶段,毕业论文的写作肯定会涉及到文献,文献是一切学问之本,所以要有文献学的功底;其次,做编辑的阶段,作为编辑需要校对引文,引文的校对需要文献学的功夫,在校对每一位作者的文献之后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资料库。同时我们还要做第一手的文献,很多问题的脉络和解决策略都在第一手的文献里面。最后,做老师的阶段,要读经典,读第一流的经典。从文献学的角度说,对于经典要有扎扎实实的白话文翻译,但是我们看现在对于孔、孟、老、庄的白话翻译,往往翻译成白话,文章本身的美感就消失了。白话文的翻译是最扎实的功夫。李尚信教授则从学与思的角度分析了文献对于研究的根底性作用。他认为学与思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学”属于吸收知识的过程;“思”代表着创新意识。学习是必须的,思考也是必须的,但是研究者有时很难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有的人学得多,思考的少,这样就没有创新意识,把别人的知识装在自己的脑子里,没有进一步的分类、综合与消化,结果自己成了两脚书橱,行走的书架;另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思而不学,我们在编刊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文章通篇是自己的思考,没有文献的佐证,他的文章也很有逻辑性,但是这样的研究,它的前提往往是不可靠的,没有“学”所代表的吸收知识的过程,“思”就沦为空想、妄想。只有把这两方面你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学问,但是学与思之间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这样一来,在“学”与“思”的问题上,就要允许研究者有一定的偏向。

[收稿日期] 2019-12-30

[作者简介] 马士彪(1991—),山东临清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郑涵丹(1998—),广西永福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二、哲学文献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是近年中国哲学史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诠释的差异,本质上是不同诠释方法运用的结果。虽然文献是一切研究的根基与灵魂,但是,文献的理解同样也离不开方法的运用。李振纲教授总结出精读经典的三个方法。首先,直接与经典照面,阅读原文,这样就能读懂经典的十之六七,但是还有十之三四是不懂的,因为经典本身带有模糊性,正是因为有模糊性,才能营造出更为广阔的解释空间;其次,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一部分来自经典本身,一部分则来自现实;最后,读经典要善于抓住核心范畴,抓住经典的核心概念后,还要善于归纳,例如讲老子的“德”这个核心范畴,就要透过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归纳出“玄德”“孔德”“上德”“建德”等概念,这样老子关于“德”的学说就完全呈现出来了。杨海文教授认为,文献的功底是第一步,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解释解释学技巧,解释的好,“功夫在诗外”。杨海文教授以自己对于孟子学的研究为例,他在在做进一步的研究之前,先句读了孟学史上的数千篇第一手的文献,这样就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孟子学文献库。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需要对于自己的文献库不断进行再次分类,这样一来,每一次的分类之后,研究者对于文献就会有新的认识,开辟出新的领域。李尚信教授同样强调做研究要有解释学的技巧。他认为,研究方法说到底是如何理解经典、解释经典的问题。现代的研究往往借鉴西方的解释学方法,这种借鉴当然是允许的。跨学科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以现象学的方法解释传统经典、易学与分析心理学的汇通等等。但方法运用的效果,取决于研究者对于方法的理解,如果研究者本人还未彻底消化这种方法,那么他的诠释活动可能会出现“过度诠释”的问题。只有真正地理解了其他学科的方法,才能融会贯通。此外,还要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他认为,任何思想家都是在一定时代背景条件下的存在,他的思想有着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双重面向,研究者必须对于研究对象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做出相应的分析;此外,必须将他的主张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只是就某一思想家的主张立论,而不关心他主张的思想史背景,这样的研究是单调而抽象的。罗安宪教授从“概念的分析”与“系统的建立”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具体阐释。德里达曾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罗安宪教授指出,这是对中国哲学的误解,现在要以哲学的方式讲中国哲学。哲学作为哲学有两个关键:“概念”与“系统”。研究中国哲学要用概念说话,将思想讲成一个有机的系统。首先,要有概念的分析。概念的分析大体遵循三个环节:追根溯源、引经据典、分析批判。举例而言,如对《论语》“学而优则仕”的解释,首先需要了解“学”“优”两个概念的内涵,把《论语》中的“学”罗列出来,具体地分析,是“内证”;“优”在《论语》中只散见,从《论语》中看不出“优”的具体涵义,这就需要“外证”和“旁证”,将先秦文献中的“优”列出来,进行具体地分析。“概念分析”只是第一步,还要建立“思想系统”。思想系统的第一个关键是“内通”。举例来说,如《老子》书中的“三宝”的意思需要参照其它章节才能理解,“慈”是第49章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俭”是第59章“治人事天莫若啬”中的“啬”;“不敢为天下先”是第7章“后其身而身先”。再者,庄子讲“以明”,“明”是什么意思,需要参考《老子》文本,《庄子》中的“明”就是《老子》“知常曰明”中的“知常”的意思。思想系统的第二个关键是“关联”。“内通”后还要建立一个概念的系统,比如孔子思想有三个核心概念:“礼”“仁”“君子”。“礼”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礼”还要上升到“仁”的高度,而“礼”与“仁”又指向君子人格。我们现在讲中国哲学就需从概念入手,然后把它搞成系统。王建平编审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比较了哲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的不同。他认为,社会科学的方法和人文学科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两者的共通处在于都要做文献的研究。王建平编审结合自身编刊的经历指出,现在的哲学文章,往往都是在阐释某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或者解决经典文本中的某一具体问题,他表达了对于这一现象的担忧。哲学对于其它社会学科而言,是引领性的学科,应该强调思想上的创新,这才是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不能停留在解释的层面上。要进行思想上的创新,就不能运用归纳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并不能产生出新的观点,但是现在的文章基本是对于孔、孟、老、庄某个观点的归纳与解释,这样的研究都是指向源头的,无思想上的创新。但是西方的哲学研究就有很多的创新,比如马克思本人的研究,他的很多思想就不是从古希腊那里演绎出来的,那么我们的哲学研究如何可能有创新呢?这是每一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三、哲学论文的写作技巧

写作技巧属于研究结果的表达与呈现的问题,如果以更好的形式将所要传达的内容呈现出来,这就涉及到技巧的运用,这是每一个研究者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杨海文教授从三个方面对哲学文章的写作技巧加以

说明。首先,技巧总是个人的,《孟子》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能工巧匠只能把正确的做法传授给徒弟,但是他却不能保证门下的每个徒弟都能有高超的技艺,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到修行就进入了第二个方面,《孟子》说:“美成在久。”任何美好的成就都来自长久的坚持,有了方法,还要加上个人的勤奋,这是第三个方面。固然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人,但是如果没有后天的勤奋与努力,那他的天赋也会慢慢消散,所以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能补拙,后天的努力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胡静编审结合自身的审稿经验,对于哲学论文的写作给出了具体的建议。第一,写作者的学术视野要宽广,善于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从多元的角度去审视同一个问题。第二,好的文章既要有扎实的文献的支撑,还要符合相关研究的规范。第三,作者的心里要有读者,文章写给谁看,想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内容,读者能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此外,作者写作的时候应尽量将晦涩难懂的概念转化成读者能读得懂的语言。第四,要有自己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最好是从自己所阅读的文献中内生出来的方法,而不是仅仅去简单的模仿别人的方法。第五,一篇好的文章,还考验着作者的文字感受力,以什么样的文字将自己的观点呈现出来,才更有表现力,这需要作者有很好的语文功夫。第六,选题的问题。综合性的刊物更倾向于综合性、理论性、原理性的选题。最后是题目表达的问题,很多作者喜欢用“维度”“向度”这些词汇,使用这些词汇,一定要建立在对它们内涵的确切了解上,不能为了赶时髦就把它们放在自己文章的题目中。王建平编审认为,写作技巧的前提是肚子里面要有东西,肚子里面有货,但是表达不出来,这就是茶壶倒饺子;或者能够表达出来,但是表达得不够规范,或者是没有逻辑。他结合自己的审稿经验指出,文章应该避免那种概念、内涵、特征、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的简单罗列式的表达,这属于教科书式的写作方式,一般编辑看到这样的稿子就会丢到一边。此外,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要求,刊物分为综合性与专业性两种,一般综合性的刊物更喜欢比较宏观的话题。李尚信教授则结合自身的审稿经验,对于文章的具体写作规范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是摘要的写法。摘要一般的套路是照搬前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地说出文章的核心观点,以及文章的创新点,换言之,摘要需要表现出文章的核心观点与创新点。其次,对于前人研究的综述。很多文章或者没有这一部分,或者简单地罗列学界已有的研究,这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写法是,你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目前学界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观点,可以分成几个方面,已有研究的合理性是什么,不足处又在那里,还有什么有待解决,总之需要从这个综述种引申出一个问题来。最后,是规范的问题,文章写好后,不要着急投出去,要检查以下有无表达上的问题,有无错别字,格式是否符合所投刊物的规范等等。

四、学术问题处理的工夫

李承贵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论文或著作的写作,学术论文或著作一般都要探讨学说或思想的形成、命题和概念的意蕴、学说或思想的性质、经典解读的状况等,这些问题处理得当,也就意味着研究的成功。李承贵教授指出,以往我们探讨某种哲学学说的形成习惯用唯物史观方法,这当然是我们分析一种学说形成的基本原则,但这显然不足于帮助我们全面认识一种学说的形成,他以王阳明心学的形成为例,认为可以采取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等,社会学方法要求考察王阳明弟子们在接引弟子、刊刻语录、处理家务、协调纷争等方面对于阳明心学形成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而心理学方法要求对王阳明在其心学形成过程中心理方法、心态方法应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从而强调对于某种学说或思想的形成必须准备多种视角,要根据某种学说或思想自身形成的情况选用研究方法。至于命题或概念的意蕴的解析,李承贵教授认为,需要做到四个“拉回”,就是将所研究的命题或概念拉回到历史文化系统、思想义理系统、现实社会系统和身心系统,其中现实社会系统和身心系统最为重要。所谓拉回到现实社会系统,就是将被理解的命题或概念放在当下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分析其意蕴,比如朱熹提出的“心统性情”,我们除了对其进行义理分析之外,还应该将其拉回到现实社会中,就是说,“心统性情”之于现实社会有怎样的效用,它是不是可从现实社会中找到注脚?所谓拉回到身心系统,就是将被理解的命题或概念与研究者的身心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研究的命题或概念都是不离人的,所谓“道不离人”,只要将命题或概念与身心加以对照,才能形成真切的把握,比如,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打了近两千年的笔墨官司,仍然看不到解决的迹象,那么我们不如回到每个人自身想想,因为是“人性善恶”,大家都是人,所以每个人可以问问自己的“性”是善是恶,这就是从身心上来理解命题或概念。关于哲学思想性质的判断,李承贵教授提出“四种效应”说,他认为分析某种学说的性质可由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复述效应”,就是说,如果一位哲学家对某种观点或主张,在其一生中重复叙述,那么可以判断这种观点或主张就是哲学家思想的性质;二是“职场效应”,就是指哲学家的观点受其社会身份(政治或经济

地位)影响,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三是“生命效应”,就是指哲学家的生命状况影响他思想的性质,哲学家是人,人都免不了生老病死,我们发现,哲学家身体健康时与身体病痛时、青壮年时期与老年时期,其思想倾向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可以根据哲学家身体状况判断其思想性质;四是“理想效应”,就是指哲学家除了社会角色之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是社会的批判者,哲学家的思想不可能完全受其社会身份限制,更多的情况下是突破这种限制表现出超越性和理想性,因而必须注意哲学家哲学思想中的超越因素或理想因素。李教授还谈到了关于古代哲学经典解释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能根据某种解释古代哲学实践的失误而否定所有解释实践,更不能否定被解释经典。比如,许多学者解释《道德经》,但解释的方法和效果肯定不尽相同,既不能因为解释方法使用不当而否定被解释经典,也不能因为解释失误而否定所有解释方法,因为对《道德经》的解释主体众多,而解释方法并不具有主宰性。李教授说,如果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中,大家能将这些问题处理好,那么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成绩是值得期待的。

五、中国哲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黑格尔将哲学比喻为普照大地的阳光,这个比喻说明,哲学关注的是终极性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只是拥有解释技巧的“技匠”,中国哲学关注的问题仍然是终极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必须对时代的问题有所回应。李振纲教授认为,哲学史的研究一定要切入现实问题,问题意识除了来自经典本身外,还源自于现实。做哲学并不单单是为了抒发个人的思古之幽情,复古主义已经行不通了,一个现代人不可能退回到秦汉去。所以,必须带着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钻研经典,在文献中寻求化解之道。生产、生活、生态、生命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必须有对现实问题的感知,不可能在社会之外研究哲学,但作为研究者,也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观照距离,否则很多问题就看得不是那么透彻,但是一定要有真正的了解。李尚信教授同样指出,做中国哲学不能只是研究文本,还要关注现实,为现时代服务。学习中国哲学不仅仅是学习中国哲学史,还要建构当代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目前关注生生哲学,中国哲学当然是生生哲学,也是生命哲学,更是生活哲学,是对于生活本身的哲学思考。生活是我们的全部意义,生活并非一个个事件的集合,它是生成的。哲学对于生活意义的揭示是终极性关怀。杨海文教授则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解读中国哲学的学术关怀。杨海文教授从文献的视角指出,“文献”二字,“文”是“典籍”,“献”者“贤也”。《汉书·艺文志》对应的是“典籍”之“文”,而《汉书·古今人表》对应的是“献”,是文献背后的人,两者合起来对应的就是“文献”。他指出,二十四史的传统,至少有一部分是在文献中建立起自己的表达框架,研究者在有了历史意识之后,还要回到今天,回到当下。杨海文教授特别强调对于古代文献要有深情厚意,对于寄托在文献之内的思想者要有“温情和敬意”,只有这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一代代薪火相传,这样的态度也就是人文学的关怀。朱承教授则立足于中西古今的宏大视野,从五个方面阐述中国哲学的学术关怀问题。首先,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不管是早期印度哲学、中国先秦哲学还是古希腊哲学,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事传统哲学的研究,绝对不是为了仅仅满足个人的兴趣或者个人的思维游戏,传统哲学的研究,需要对于时代问题做出哲学的回应,开出新的研究视域;其次,人性、义利、有限无限等普遍性、终极性的问题,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当今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只是我们和古代思想家所面对的思想资源已经不再一样,研究者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时代的解答。在做研究的时候应该怀着在思想史上留痕的信念与抱负;再次,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历史兴趣,还要解决时代的问题。面对古代文献,有两条不同的研究道路,一条道路将文献视为对象,一条道路将文献视为资源,两条道路代表了为学和为道的不同。如今大多数文章都将古代文献视为对象,这样肯定会丰富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具有为学的意义。但是文献不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还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资源。将文献视为解决时代问题的资源,可能会出现断章取义或者过渡诠释的问题,但这是在解决时代问题时,所不可避免的问题。面对时代问题,研究者不能满足于历史性知识的获致,而是要把古代文献作为思考的资源,以文献的三江之水浇灌我的一丸之地,这样就会打开新的天地。复次,西方哲学的传入,是一个本体论的事实,借助西方哲学的概念来梳理中国传统哲学,这种方式显然有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建构自己话语体系的同时,也不应刻意地拒斥西方哲学,这会使我们丧失一座宝山。世界哲学不仅仅是一种参照,还应该是资源,在消化吸收以后,还要参与世界哲学的探讨,使得我们自己的哲学也成为世界哲学的资源。最后,如果将哲学研究视为套路,就会走向对于现成套路的模仿,但情怀是模仿不来的。情怀也不是写在脑门上的,要真正地去思考哪些普遍性、超越性的终极问题。做哲学研究要有套路和规范,但是如果没有情怀,就会丧失

生命力。

在自由讨论的环节,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代玉民博士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心得,他认为,现在流行的做法是将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欧陆哲学相结合,不过,可能今后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借鉴英美哲学的方法,因为英美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在某些层面上可能更适合中国哲学。举例而言,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以逻辑的方法解读先秦哲学思想,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以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金岳霖更是用逻辑的方法写成了《论道》,这都是运用了英美分析方法的成果。在先秦儒学那里很重视分析推论的方法,如孔子讲“正名”,《周易》讲的“象”的学说,在道德的意味之外,还有一种推论的逻辑在里面。此外,与会专家就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王金凤博士提出的儒学研究中经学化与哲学化的二元对立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杨海文教授认为,儒学研究中经学化和哲学化倾向的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两种倾向背后的价值取向是不一致的。李振纲教授认为,科举制与君主制废除后,传统经学已经淡出时代,现在所说的经学更重视儒学本身的价值问题,但儒学文献的研究更应该是哲学性的,需要回应现时代的问题。李尚信教授进一步指出,一般提及经学的方法,所针对的主要是“五经”的体系,而非“四书”,相较于“四书”,“五经”的思想更为具体化。哲学性的研究则更为抽象,但不能仅满足于抽象地说理,更要贴近具体的现实生活。与会专家还围绕老庄的“道”“德”“自然”等观念进行了探讨,气氛热烈,时有不同意见的交锋,时有思想上达成共识的喜悦。

最后,李承贵教授从四个方面对讨论会进行了总结。一是内容丰富。他认为这次讨论会人数虽然不多,但讨论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古代哲学文献把握、方法论的反思、论文写作的技巧、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西古今的思想碰撞、个案学术问题的处理等。二是思想深刻。他认为这次讨论既有文献的深度发掘,又有方法论上的深刻反省,还有各位专家做研究的切身体会,每个人都将自己最精彩的研究心得贡献了出来。三是关怀自信。他认为大家在讨论中,强调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价值,希望做中国哲学研究要充满自信,而中国哲学研究中呈现中国哲学的特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同时指出专家们还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使命提出了希望,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要反映时代的问题、解决时代的问题,以体现中国哲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四切近实用。他认为各位专家、编审所奉献的,不仅有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方法,也有中国哲学论文的写作技巧,不仅有处理中国哲学问题的工夫,也有如何选题、投稿、组织文字等方面的开示,从而使在座的博士生、硕士生们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方法论洗礼。李承贵教授对各位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谢光前)